

极边、次边、近里： 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

郑 涛 张 文

学界关于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到底是二级制还是三级制存在分歧，并有许多不够明确的地方。本文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在西北、北方两个方向是由极边、次边、近里构成的三级制。其中，河东路与河北路由于与辽的关系比较和缓，三级制的层级体系相对稳定。陕西路与京东路由于有西夏的和战关系以及女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仍实行三级制，但其层级体系存在或多或少或少的变动。总体而言，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是一种基于纵深防御理论的边防体系。

关键词 极边 次边 近里 北宋 边疆层级 三级制

作者郑涛，1976 年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2008 级博士研究生，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文，1963 年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 2 号，邮编 400715。

关于北宋边疆层级体系问题，此前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程龙在对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问题展开研究时发现，在西北边地，存在一种圈层结构。按照程龙的理解，这种圈层结构包括“极边”和“次边”两层。其中，“极边”是指与西夏交界的沿边州军，“次边”是指位于沿边州军与关中地区的中间过渡地带。与“极边”、“次边”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近里”，程龙认为，“近里”就是“次边”，两者没有差别。换言之，程龙认为，北宋西北边地的圈层结构包括两圈，外圈是“极边”，指与西夏交接的沿边州军，内圈是“次边”或曰“近里”，是指介于“极边”和关中之间的过渡地带。^① 2007 年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出版，从政府购买的角度提到宋朝边疆层级体系。按照他的理解，宋朝边疆层级体系由三层构成，即“极边”、“次边”、“近里”。与程龙不同的是，李晓认为“次边”与“近里”是两个不同区域，并非一物两名。不过，李晓并未就此进行详细说明。^②

^{*} 本文为西南大学 211 课题第三方向“西南民族社会多元和谐发展研究”子课题“历史时期西南政区变动与民族关系演进”的阶段成果之一。

^① 参见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0 页。

^② 参见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5 页注释。

2010年，杜芝明、黎小龙合作发表了《“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①一文，提出了宋朝普遍存在一个边疆层级体系，并不限于西北。关于“极边”，文章引用宋人的话说，就是有“边面”的地带。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是“外边”，系指宋朝与“外国”接壤地带，这些“外国”即《宋史·地理志》中所列辽、金、西夏、吐蕃、大理、交趾等。一种是“内边”，系指宋朝境内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是羁縻州）接壤的地带，范围主要限于《宋史·蛮夷传》中所列诸族。关于“次边”，文章认为系指无“边面”且与“极边”紧邻的州军，即宋朝统治区域相对于最外围的次级地带。关于“近里”，文章也做了说明，认为与“次边”混用，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综合来看，这种意见还是认为宋朝边疆层级体系是二级制。

综上所述，关于北宋边疆层级体系的层级划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二级制，即边疆层级体系由极边、次边两层组成，“近里”包含在“次边”之中（或反之，“次边”包含着“近里”之中）。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三级制，即边疆层级体系由极边、次边、近里三层组成。不过，对于以上两种意见，显然二级制论证更为详细，也易为人接受。三级制只是一个意向性意见，并未有明确的论证。

关于此，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它是关系到宋朝边防制度与边疆思想的基础性问题，有必要辨别清楚。根据笔者的理解，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应该是三级制，即由极边、次边、近里三部分组成。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北宋边疆层级体系的三级制主要适应于西北、北方，并不完全适用于西南边地。事实上，西南边地的情况极为复杂，既有针对交趾等“外国”而言的“外边”，又有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内边”，前者所针对的交趾等“外国”之地位绝非辽、夏可比，后者所针对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不同于所谓的“外国”，因此，无论“外边”还是“内边”，情况都无法与西北、北方可比，而呈现出不同于上述三级制的西南模式。大体而言，西南地区的“外边”以“交趾”“大理”为参照划分极边、次边、近里，仍以三级制为主。“内边”则与“省地”、“生界”、“化外”等民族地理概念纠缠在一起，情况格外复杂。因此，关于西南边地模式问题，当另文讨论。二是宋朝边疆层级体系的三级制主要限于北宋时期的西北、北方，南宋时期由于境土狭蹙，尽管也有“近里”的提法，但由于与金朝接壤的北部边疆一般难以形成三级制的纵深，从而呈现与北宋时期有所不同的边疆层级体系。关于此，也将另文论述。

二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是三级制，由极边、次边、近里三部分构成。

关于“极边”，研究者无异议，均认为是与“邻国”接壤的第一层州军。按照宋人的话说，就是有“边面”的州军。如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上枢密院书言“河东经略司总

^① 参见杜芝明、黎小龙《“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领二十余州军,边面千余里,地接二边,帅府之重,孰过于此?”^①所谓“二边”,系指西北、北方的辽、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作“河东经略司总领二十余州军,边面千余里,地接辽夏,帅府之重,孰过于此?”又元符三年(1100),兵部上言“秦州、岷州、阶州旧为沿边,今则收复州郡甚多,恐秦、岷、阶州合为次边。其次,岚、石州已在近里,各无边面,并令改为次边,委是经久利便。”^②据此可知,“边面”是指与“邻国”相接部分。由此,“极边”是指紧邻“外国”的州军,殆无可争。

关于“次边”,系指紧邻“极边”的第二层州军。用宋人的话说,就是俯逼“极边”的州军。如元祐七年(1092),诏“以隰州为次边。以本州言所隶上平、永宁两关俯逼西界,经久备御不可缓故也。”^③据此,这部分州军不能有“边面”,不能与“邻国”直接接壤。如上引元符三年(1100)兵部言“岚、石州已在近里,各无边面,并令改为次边,委是经久利便。”^④按照这一理解,紧邻“极边”的州军无疑属于“次边”。不过,在前述相关资料中,似乎也有相反的例子。如上引元符三年(1100)兵部所言,既言岚、石二州为“近里”,又言二州当改为“次边”,的确令人困惑。正因为如此,前述杜、黎文章中据此认为,“近里”与“次边”是一物两名,并无实质差异,即“近里”包含“次边”,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此外,杜、黎文章又进一步引述范仲淹在《再奏乞蒋偕转官知原州》中说“况泾州是近里”,^⑤而庆历三年(1043)泾原安抚使王尧臣上奏中又说“泾州虽为次边”^⑥两则材料,进而更加坚定了“次边”与“近里”本无差别的结论。不过,当我们结合地图^⑦细究上述史料时,却有了两点不同发现:

其一,岚州位于河东路北部,其正北方向紧邻与辽交界的岢岚军。以此为准,则岚州当为“次边”。但岚州东北方向紧邻宪州,宪州之北紧邻与辽接壤的宁化军。同时,岚州西北紧邻保德军,保德军之北紧邻与辽接壤的火山军。以此为据,则岚州当为“近里”。与此类似,紧邻岚州之南的石州也是如此。以正北方向为准,上有岚州,岚州上有岢岚军,则石州为“近里”。但石州西北方向紧邻与西夏接壤的宁晋军,以此为准,则石州当为“次边”。

其二,泾州位于秦凤路西北,其正北方向紧邻与西夏接壤的原州,以此为准,则原州为“极边”,泾州为“次边”。但泾州西北紧邻渭州,渭州之北为与西夏接壤的镇戎军,以此为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春正月丁巳条,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5之43,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按:原文为“元祐三年”,实误。前揭杜芝明、黎小龙文章中已指出,此不赘述。

③ 《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二月丙子条。《宋会要》方域12之5所记时间为“元祐六年”。

④ 《宋会要》方域5之43。

⑤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下《再奏乞蒋偕转官知原州》,《四部丛刊》本。

⑥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春正月丙子条。

⑦ 本文主要参考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与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所录地图。其中,前者提供的北宋地图仅限政和元年,有一定局限性;后者提供的北宋地图包括宋初、太平兴国四年、咸平二年、天禧四年、元丰八年、宣和五年等不同时段,更为全面。此处主要以李昌宪提供的地图结合史料所示年代进行对比研究。

准，则泾州当为“近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提供的政和元年（1111）秦凤路州军分布图，原州之北尚有镇戎、怀德军，则原州当为“近里”，泾州无论如何不应称为“近里”。实际上，庆历年间（1041—1048）的原州直接与西夏接壤，处于“极边”位置。事见前引范仲淹《再奏乞蒋偕转官知原州》一文，其文云：“见泾原路西北有镇戎军，并山外城寨及东北有原州，最逼贼界。”

若上述分析不误，则“次边”与“近里”的关系问题便清晰了许多，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结论：一是“次边”与“近里”确是不同的，“次边”是“极边”之下的第二层州军，“近里”是紧邻“次边”的第三层州军。二是当某一州军同时处于“次边”与“近里”地理位置时，若无朝廷明文规定，则既可视为“次边”，又可视为“近里”，如上述泾州事例。若经朝廷批准，则可做明确处置。不过，其原则似乎是就外不就内，就“次边”而不就“近里”，如上述岚、石二州事例。按照这两个原则，文献中记载的其他令人困惑的内容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如关于隰州地位问题，元祐七年（1092）诏“以隰州为次边。以本州言所隶上平、永宁两关俯逼西界，经久备御不可缓故也。”^①隰州位于河东路西部，其北依次有石州、岚州、岢岚军，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次边”，但其西部紧邻与西夏接壤的延州，以此为准，则可视为“次边”，可证文献记载无误。

关于“近里”，系指紧邻“次边”的第三层州军。用宋人的话说，就是靠近“里”的地方。关于“里”，可能指“腹里”，即远离沿边的内地。如北宋中期，曾于熙、秦等沿边州军遍置汉蕃弓箭手，防御边面。崇宁二年（1103），以“今拓境益远，熙、秦汉蕃弓箭手乃在腹里，理合移出。然人情重迁，乞且家选一丁，官给口粮，团成耕夫，使佃官庄，遇成熟日，除粮种外，半入官、半给耕夫，候稍成次第，听其所便。从之”。^②南宋时期，仍有“腹里”的说法。如南宋初年，金兵曾深入江南，建康府一度成为沿边。后金人退去，叶梦得说“二大將既分宣抚两淮，本道乃在腹里，非所虑。或谓万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职。”^③据此可见，“腹里”当指远离沿边的内地。不过，宋朝的“腹里”所指并不严格，与元、明两朝的“腹里”有别。元朝的“腹里”特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及以西的地带，由中书省直辖。明朝的“腹里”特指内地，与“边关”相对。如唐顺之言“盖边关与腹里相持衡之势，一镇之财与力，止有此数。旧额虽在，积弊寔深，难以毛举。不损边关，则损腹里。损边关以宽腹里，是谓舍急算而就缓图。损腹里以益边关，亦为空腹以奉肢体。边关空缺，其虑在近，腹里耗竭，其虑在远。”^④若上论不误，则所谓“近里”，实指靠近“腹里”（即内地）的州军。

三

通过以上论述，证明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的确是三级制，由极边、次边、近里三层组

① 《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二月丙子条。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190《兵四·乡兵一·河东陕西弓箭手》，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③ （宋）叶梦得《建康集》卷9《与秦相公论防冬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明）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8《与严介溪相公书·第六》，《四部丛刊》本。

成。按照这一原则,本文试对北宋时期西北、北部边疆层级划分做一清理。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北宋时期划分边疆层级体系的单位一般以州军为限。二是此处所依据的地图,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提供的政和元年(1111)的版图为准,结论与上述论证过程中出现的北宋中期的部分划分当有不同。

陕西路 “极边”应包括阶州、岷州、洮州、河州、积石军、西宁州、湟州、兰州、会州、西安州、怀德军、环州、定边军、庆州、保安军、延安府、绥德军,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一层,与“外国”接壤。“次边”应包括成州、秦州、巩州、熙州、廓州、德顺军、镇戎军、原州、宁州、鄜州、丹州,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二层,与“极边”相邻。“近里”应包括凤州、陇州、渭州、泾州、凤翔府、邠州、坊州、同州,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三层,与“次边”接壤。

河东路 “极边”应包括晋宁军、麟州、府州、丰州、火山军、岢岚军、宁化军、代州,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一层,与“外国”接壤。“次边”应包括隰州、石州、岚州、宪州、忻州、太原府,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二层,与“极边”相邻。“近里”应包括晋州、汾州、威胜军、辽州、平定军,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三层,与“次边”接壤。

河北路 “极边”应包括真定府、定州、保州、广信军、安肃军、雄州、霸州、清州、沧州,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一层,与“外国”接壤。“次边”应包括赵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莫州、保定军、河间府、永静军、德州、棣州、滨州,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二层,与“极边”相邻。“近里”应包括邢州、冀州、恩州、大名府、博州,属于边疆层级体系的第三层,与“次边”接壤。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极边、次边、近里三者的界定,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划分,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复杂局面,三者尤其是“次边”与“近里”的关系往往有所不同,边疆层级体系存在一定的变动情况。纵观北宋时期西北、北部边疆,由于与辽的关系相对稳定,因此北部边疆的层级体系相对稳定,大体实行的是按照第一、二、三层州军布局的三级制;而西北地区由于与西夏的和战关系起伏不定,导致陕西路的层级体系变动较大,尽管也实行的是三级制,但有时并不能严格按照第一、二、三层州军布局的方式划分层级。山东半岛沿海由于与辽、女真的关系问题,也经历了一定变化,但实际变动相对有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以下谈谈西北的陕西路层级与京东路层级体系的变动问题。

其一,陕西路州军的层级变动问题。北宋时期,由于与西夏之间的战争以及宋朝的拓边行动,西北边境线屡有变动,因此,陕西路的层级关系也曾发生过一些变动。如秦州原本属于“极边”,与西夏接壤。此后,由于边地拓展,秦州变为“次边”。元符二年(1099),曾布言“今泾原进据天都,熙河自努扎建城寨至会州,故两路边面相通接,而秦州遂为腹里。”^①即秦州一度甚至被称为“腹里”。而更为复杂的变化发生在熙宁三年(1070),是年,韩绛奏称“今将义勇分为七路:鄜、延、丹、坊为一路,邠、宁、环、庆为一路,泾、原、仪、渭为一路,秦、陇为一路,陕解同、河中府为一路,阶成凤州、凤翔府为一路,乾耀华、永兴军为一路。逐年将一州之数,分为四番,缘边四路十四州,每年秋冬各用

^① 《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癸亥条。

一番屯戍，近里三路十二州军，即令依此立定番次。未得逐年差发，遇本处阙少正兵，即得勾抽或那往次边守戍。”从之。^①关于这条材料，杜芝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做了解读，认为所谓“近里”三路，即文中所说的“陕解同、河中府为一，阶成凤州、凤翔府为一，乾耀华、永兴军为一”，正好12州军。^②若此说成立，则此时陕西路州军的层级体系是按照“路”来划分的。即由“缘边”四路14州军构成“极边”与“次边”地带（其中“极边”的参照仅以西夏为准，如与吐蕃接壤的阶州仅算作“近里”，不算作“极边”），以及由三路12州军构成“近里”地带。这一层级体系划分，不可能严格按照前述第一、二、三层次州军的布局划分，原因无非是出于对夏作战防御的需要。

其二，登州等沿海州军层级变动问题。北宋时期，防御重点主要在西北、北方二边，都是陆地，海疆防御并非重点。不过，山东半岛的登州等州军也有一定的边防意义，因此也涉及层级体系问题。元丰八年（1085），苏轼曾言“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③据此可知，自宋初开始，登州即作为“极边”，防备“北虏”。此处所谓“北虏”，当指契丹。^④政和五年（1115），登州与莱、潍、密四州成为“次边”。《宗忠简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7《遗事》载“有旨升登、莱、潍、密四州为次边，遴选能吏可任守贰者。”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升”登、莱、潍、密四州为“次边”，说明此前四州曾被降为“近里”。原因应该是出于对契丹、女真关系的判断。元丰年间（1078—1085），登州为“极边”，是因为此处面向渤海，海路可通辽朝，不得不提升防御级别以备万一。“虏知有备，故未尝有警”。^⑤此后，与辽的关系平稳发展，女真似乎也不构成威胁，因此降为“近里”。政和年间（1111—1117），女真突然崛起，成为新的威胁。政和四年（1114），完颜阿骨打两次出兵击败辽朝，尤其是十一月大败辽朝十万之众，威望大增。次年，即政和五年（1115）正月，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局面为之一变。为此，宋朝不得不有所警觉，将防御重点转向金朝，从而提升防御级别至“次边”。

综合看来，北宋边疆层级体系确是三级制，由极边、次边、近里三部分构成。关于这种层级体系的性质，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研究。程龙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与军队的后勤补给有关，即“极边”防御，“次边”（含“近里”）提供补给。^⑥李晓认为，这种边疆层级

① 《长编》卷216，熙宁三年十月乙亥条。

② 参见杜芝明《宋朝边疆地理思想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现藏西南大学图书馆。

③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21《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语文出版社2001年《三苏全书》点校本。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文集》卷52同文作“登州地近东北，号为极边，塞外山川隐约可见”云云，对“北虏”做了删改，或许是为了提高女真的历史地位。如此一来，或以为“北虏”指女真。实际上，北宋时期宋人所谓“北虏”均指契丹。如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四部丛刊》本）卷12《杜公求退第五表》云“螟蝗交作，水旱不调，故北虏移割地之书，西羌遣求币之使。”“北虏”指契丹，“西羌”指党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四部丛刊》本）卷下《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中国之兵，讨伐未利，而北虏举十万众，谓元昊是舅甥之邦，责中国不当称兵，此交构之迹，更何疑哉！”文中的“北虏”指契丹无疑。

⑤ 《苏轼文集》卷21《登州召还议水军状》。

⑥ 参见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第270—274页。

体系与财政制度有关,即根据极边、次边、近里区分不同的财政区,属于经济地理的范畴。^① 杜芝明、黎小龙认为,边疆层级体系属于边疆思想的范畴,是宋人对边疆地理空间的一种特殊认识。^② 依笔者所见,北宋的边疆层级体系首先是一种边防体系,其理论基础源于宋人的纵深防御思想。它的一般规律是:第一层“极边”地带以寨堡为据点驻守,起到防止边警的作用。对于小股入侵敌军有阻止作用,对于大规模入侵的敌军主要起到预警作用。第二层“次边”地带为重点防御区,屯驻重兵,遇有大规模入侵,则往往于该地带阻截敌军。第三层“近里”地带为支援地区,一方面为“次边”提供后勤补给,另一方面作为最后防御地带阻截敌军。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 书 讯 ·

李鸿宾教授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 2011 年 1 月出版发行。该书全文 30 万字,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 23 篇论文,包括 18 篇史学专论,内容涵盖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隋朝的北部防务、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唐朝的华夷观及其变化、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朔方军、东突厥及唐朝后期北部地区的民族等;墓志铭考释 3 篇,主要是对安菩、穆泰、何文哲等三个墓志铭及其相关问题的考释;史学评论 2 篇,主要是作者对近年出版的李大龙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和王明珂著《游牧者的抉择》的评述。《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虽然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但是作者近年来对隋唐主要是唐朝北部边疆防务和民族问题的新认识,对于隋唐边疆史尤其是北部边疆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① 参见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第 105 页注释。

② 参见杜芝明、黎小龙《“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2 期。

CONTENTS

MONOGRAPHS

Return to “the Ancient Borderland Corridor of Miao Ethnical Group” (古苗疆走廊) ——a New Way to Research on Southwest Region ,National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Yang Zhiqiang Zhao Xudong Cao Duanbo (1)

The east post road (东路驿道), which was opened from Huguang ,Guizhou to Yunnan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as not only the major transportation lifeline to maintain the mainland and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s ,but also the influencing factor to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territory in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ancient borderland corridor of Miao ethnical group” original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rridor to the formation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nationalization (国家化) process of the borderland of Miao ethnical group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analyzes primari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and ethnic culture of this corridor. The possibility of declaring “the ancient borderland corridor of Miao ethnical group” as “the heritage of world cultural route” is analyzed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the ancient borderland corridor of Miao ethnical group the formation of Guizhou province nationalization cultural route

The Edge ,the Frontier and the Suburb: the Three Hierarchie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eng Tao Zhang Wen (14)

Opinions are divid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on the point of two or three hierarchie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re are still uncertain points on it. This paper believes the three hierarchies which include the edge ,the frontier and the suburb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 northern directions. The three hierarchies in Hedong Lu (河东路) and Hebei Lu (河北路) were relatively stable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o and them was steady. However ,the three hierarchies in Shaanxi Lu (陕西路) and Jingdong Lu (京东路) changed more or less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war with the Western Xia regi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üzhen. Overall ,the hierarchie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stitute a kind of frontier defense system which based on the depth – defended theory.

Key words: the edge the frontier the suburb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orderland hierarchy the three hierarchies system

The Mongolian Clan of King Bin (幽王家族) and the Northwest Frontier Defense in the Yuan Dynasty Yang Fuxue Zhang Haijuan (21)

The Mongolian clan of King Bin originated in the late 13th century and the earliest ancestor was the brothers Chubo and Heban of Chagatai lineage (察合台系) who went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o Kubla Khan (忽必烈汗) for shelter. In the early of the 14th century ,the four Wulusies (乌鲁斯) of King Bin , Su , Xi’ ning , and the Might Xi’ ning stationed and grazed respectively in Ji-